

陳伯達等著

閻錫山批判

新華書店晉察冀分店印行

目次

編者的話

閻錫山批判

陳伯達

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的一封對帝書

續簡亭

駁斥閻錫山荒謬宣傳

薄一波

晉西事變真相

韓鈞

附錄

(一) 閻錫山部六十名軍士決死隊八路軍

(二) 閻錫山所部官佐一八〇名通電全國反對內戰

(三) 閻部將校二百餘人通電全國呼籲和平

(四) 請看閻錫山部下的日記記着閻逆多少罪惡

閻錫山批判

陳伯達

(一九四四年八月)

最近西安各報公佈了閻錫山對中外記者團的談話，其內容除了對於抗戰中流砥柱的中國共產黨和十八集團軍（八路軍）極盡造謠譏諷之外，沒有其他的東西。對於閻錫山這個人，我們是熟悉的，一九三五年，日本帝國主義者高唱反共，向華北伸出其侵略魔手的時候，閻氏就是首先成爲反共應聲蟲的一個，那時候，他那一大套一大套的反共『理論』都捧出來了。一九三一年，他在日本帝國主義租界地的大連爲反共而寫的所謂『物產証券與按勞分配』也發表了。爲了達到其反人民反民主的目的，閻氏對於當時揭起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大旗的中國共產黨，不惜採取一切最無聊的造謠中傷手段，這裡我們不想多費筆墨去敘述它。抗戰開始後，雖則中國共產黨和八路軍在山西多方面幫助了他，希望他能够在敵人進攻的面前站得住脚，但是閻氏始終念念不忘於反共，把反共放在抗戰的前面，繼續他在抗戰前對於中國共產黨和中國共產主義的造謠攻擊。不過這一

時期，他的反共是隱蔽的，不公開登在報紙上。民國二十七年（即一九三八年）七月（有一個單行本又說是九月），他在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上發表一個『建立中心思想』的講話，全篇沒有向日本帝國主義射出一箭，一切的箭都集中向共產主義射來，對於他過去所造謠又重複一遍，並作了一番小小的概括，說什麼共產黨『欲貫澈共產主義的主張，須繼續不斷天天的殺人』，『更不能不提倡仇父，鼓勵女子裸體遊行』（見閻氏『救國言論選集』第二輯）。這些，可以說是造謠造到無聊之極了。可是，閻氏却還在那裡滔滔不休地喧嚷着，希望取得那些與民為敵的人的信任。共產黨因為還想團結他一道抗戰，對於他的各種無理取鬧，向來採取容忍的態度，即使有同志對他發過一點批評，態度也是溫和的。關於他勾結敵人的事實，一直希望他改悔，長期地沒有把它公佈。可是閻氏不但沒有中止對敵人的勾結，而且沒有認為共產黨人對待他所採取的容忍或緘默是一種好意，反認為可欺。在他那裡繼續進行一切反共的思想宣傳，最近對中外記者的談話，竟然是那末信口誣衊了。對於閻錫山這種肆無忌憚的造謠毀謗，最好的回答，當然是揭露各種的事實，而解放日報八月十一日所登載的太行電訊，八月十四日所登載的薄

一波同志、韓鈞同志的談話，八月十六日及二十四日所登載的續範亭先生的文章，就是最好的回答。這些消息、談話和文章都暴露了閻錫山勾結敵人、反對人民的鐵的事實。我這篇東西，只是想就閻錫山的思想及其實踐的若干問題加以檢討。有的問題，以前有同志說過的，這裡就不再說，或者少說，有的問題，如係比較次要的，這裡也不準備去說它。

一 閻錫山的出發點

抗戰以前和抗戰以來，閻氏各種花樣翻新的『學說』，和他在政治與經濟上的措施（即所謂『新政策』），是有他的一貫出發點的。他這個出發點既不是爲人民，也不是爲抗日，而是爲維持他獨自在山西所已壟斷了數十年之久的寡頭專制政權。這回中外記者團到克難坡（即閻氏政權機關所在地）的時候，那裡一個『負政治責任的人』曾經這樣告訴過其中一個記者：他們近來在山西所實行的那末一套，『主要的原因，却是環境所影響，非如此就不足以維持正常的政權』。『要完成戰爭』，他坦白地說，『據我們

的經驗，爭取戰區民衆，還是比較輕鬆的工作……我們所最感困難的，是社會廣義的宣傳。爲了維持正常的行政系統，我們不能不請求應付之道。』『我們認爲，對共產主義的活動，最好的應付方法，……是健全自己的民衆組織，改善民衆生活的弱點。』（見重慶『新民報』民國三十三年六月三十日）由此可見，閻氏的政府，只是簡單的爲維持他的寡頭專制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而在閻氏看來，維持他的這種政權和應付共產主義乃是同義的東西，乃是同一的工作。至於抗戰呢？卽就早放在他的腦後了。

這類的思想，從閻氏的講演和文章中，我們可以找到很多。民國二十八年（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他有一個講話，在那裡，他認爲：只要『拿政權者』（按：實際上是一堆沒有經過任何人民合法手續產生出來的政權篡竊者）善於『適生』，政權就可以『永不會崩潰』。（見閻錫山『言論選集』第二輯二四八頁）民國二十九年（一九四〇年）二月，他又有一個講話，公開說出：自從九一八以後，他『經過數年的同中樞要人在南京、太原迭次磋商』其中大問題，卽爲『如何鞏固政治，則成爲抗戰的緊要問題』。（同上書二七八頁）閻氏這裡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作爲中國抗戰之緊要問題的，並不是如

何加強抗戰的力量，以取得勝利；却是如何鞏固他們原來所黨斷了的專制政治，以避免人民的染指。根據閻氏這段話，回溯一下歷史，也是有趣味的。民國二十四年（一九三五年）十月二十七日，閻氏有『復蔣介石先生函』，同年十二月九日，閻氏又有『對全省中等以上學校校長教職員之講話』。那時日寇窺謀華北，提出『華北五省防共自治』，形勢極端緊迫。大家知道，十二月九日又正是北平英雄的學生們舉行悲壯的示威運動，促進全國抗日高潮的日子。可是，閻氏在那裡提的問題，却絕不是如何抗日救國，而是如何『防共圖存』。他說：『能自存與自固，聯日好，聯俄亦好。不能自存與自固，聯日無益，聯俄亦無益。』他又重複地說：『靠國聯無益，靠英美亦無益，親日無益，親俄亦無益。若能自強，國聯可靠，英美亦可靠，親俄有益，親日亦未嘗無益。』（以上所引，均見閻氏『言論輯要』，線裝書，第九冊）事實上，那時閻氏連做夢也還沒有夢到抗戰這一件事，那時他討論的僅僅是——像一批可憐蟲的無恥的反動派一樣——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祈禱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蘇聯的賭博上，並計劃如何使自己得在他所祈禱的這一個『日俄戰爭』中專心從事『防共』的工作（見同上的兩個文件）。那時閻氏

所謂『如何鞏固政治』，真相就是這樣。既然他連做夢都還沒有夢到抗戰這一件事，所以也就沒有和什麼抗戰問題聯系過。他的所謂『自存與自固』，所謂『自強』，絕不是有什麼民族意義的成份在內，而是『防共圖存』，『鞏固現有的政權』，也即是鞏固閻氏及其同類者的寡頭專制政權。只要他或他們這個政權可以『適生』，『永不崩潰』，據他的意見，就使是聯日，也不算壞，却是算『好』的。你看，閻錫山就是要這樣來處置我們的民族危機問題。

至於在閻錫山所壟斷的這個寡頭專制政權下面的情況究竟是什麼情況呢？他統治了二三十年的山西，不錯，那也是個『模範省』。但是究竟是什麼樣的『模範』呢？不用我們多說，請看閻錫山民國二十四年七月二十二日在他的綏靖公署省政府紀念週上所自己供述的吧：『山西自身，爲國民經濟崩潰之自身』。『山西國民經濟，曾成破產之勢。十家九貧，十村九困』。（『言論輯要』八冊）這就是閻氏在山西的政績。從他這個政績，可以看到他這個政權究竟是什麼一回事了。這就是極端腐朽的反人民反民族的殘民以逞的寡頭專制政權。可是，閻氏無論如何，是必須維持他這個政權的，爲此，他可以支出一切代價，採取一切手段。爲此，他要加強反對人民，加強反對民主主義。而他

所以把反共的工作放在最前面，就正因為中國共產黨是最澈底地代表人民利益和中國民主主義，因此又是最堅決地代表抗日路線的政黨。爲了保持他的政權，他在人民的抗日高潮中，竟然提出『親日亦未嘗無益』，而毫不覺得羞恥。真的，這樣的話，如果不是這樣的統治者，如何能說得出口呢？

一九三五年，閻錫山和日寇的『華北防共自治』唱雙簧，提出了『防共的兩個根本大法』。他說：

『……我認爲這兩條路，均可以澈底的防共，走前一條路，可以說是用法西斯主義的防共方法；走後一條路，可以說是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爲防共方法。法西斯蒂的防共方法，是要富人增加負擔，與政府合作鞏固現有的政權，抵抗共黨勢力（按：即指抵抗人民民主勢力）的侵入。以建設農業社會主義爲防共方法，是廢除土地私有權，樹立土地公有制，消滅共黨發生的基礎。然而不能走前一條路，就不能走後一條路，走後一條路，就不能不走前一條路，其實這兩條路，均能達到防共的目的，可以當做方法的兩個階段來看，不但不衝突，並且是前後相呼應。何以呢？因爲如果走前一條路，就沒有

建築走後一條路的基礎；不走後一條路，則前一條路也就不能持久。所以這兩條路，只有緩急的不同，沒有矛盾之相左。」（『消除社會不平與防共』，『言論輯要』八冊）

閻錫山原來是公然主張以法西斯蒂的方法爲反人民反民主的基礎，而以所謂『農業社會主義』爲其補充的（關於他的所謂『農業社會主義』，見下面的分析）。他在抗戰前許多演講中，總是那末熱心介紹德意兩國的法西斯蒂反共的瘋狂運動，又那麼驚嘆地說：『遂有今日之德意兩國的政權的出現！』『遂有今日之德國政權。』閻錫山及中國境內和閻氏同類型的政權（內容如『中國之命運』一書所說），實際上是中國式的法西斯政權。

在中國人民中間有極豐富的潛存的民主主義的精神，又有以中國共產黨爲其中心代表的現代的民主主義的力量，並沒有跟隨閻錫山（及其同類）在抗戰前所倡導的法西斯蒂『防共』的路，而是和中國共產黨在一起，走上抵抗日本法西斯侵略和民主主義的道路。日寇大規模打進中國本部領土上來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起來了，抗戰爆發了，情況的發展，不能使閻錫山專心做反共的工作。日寇大隊且到了山西，威脅了他的『

無條件存在』，這時他進行了抗戰的投機，與共產黨及進步人士合作，表現要『進步』，並採取共產黨的一些號召，作爲『爭取民衆』的資本。但是大家知道：閻錫山也是有一套『以不變應萬變』的哲學的，他這個哲學，據說一部份叫做『母理』，一部份叫做『子理』。正如他自己所說的：他的『母理是永遠不變』的，變的不過是他的『子理』。他的『母理』是什麼呢？就是『鞏固政權』，就是『自存與自固』。他的『子理』是什麼呢？就是『應付一下抗戰』。因此就要和共產黨進行一定限度的合作，同時，在日寇那裡仍留了後路，即是『親日亦未嘗無益』（因此，就要繼續佈置反共的工作）。他的『子理』是不能夠離開他的『母理』的，而且只能以維持他的『母理』爲目的。抗戰的困難越增加，敵人的誘降越積極，他也就越來越不成話了。這樣，不管他表面唱些什麼『民族革命』的詞句，有些時候甚至『激烈地』唱過，但骨子裡面所緊張的，却是另一回事。政權、政權、寡頭、寡頭、專制、專制，這是閻氏全部活動的總目的。爲此目的，他竟認爲利用敵人來『肅清』八路軍和決死隊（即山西新軍）是『靈活策略』，他和敵人早已有了解解，並已有秘密的協定。敵人答應他在一定時機可以讓他回到太原

去。即如他現在的晉西地盤，也是敵人和平地讓他住足，作爲「防共」的試驗區。這些都是路人皆知的事實。維持政權和「防共」，本來對於他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現在對於他更是二而一和一而二的東西。不過在他看來，他的政權已不能只限於單純的「鞏固」了，他還需要「開展」，因爲山西在抗戰烽火中已建立有多處民主主義的政權了，所以還需要向這些抗日民主根據地「開展」，即向共產黨領導抗戰實行民主的地方「開展」，才能達到「收復」他原來所壟斷的山西政權的目的。總之，不論「鞏固」吧，「開展」吧，都是聯繫在勾結日寇、反人民、反民主、反共這一着上的。這已成爲閻氏整套的邏輯。

且看他那裡最近大吹特吹的所謂「兵農合一」吧。那裡訂的「全面突擊競賽開展辦法」，開宗明義第一條所列的目的，乃是「開展政權」四個大字，並不是旁的什麼字句。還再看他自己對於實行「兵農合一」的真正目標的說法吧：

「你們對實行兵農合一，不只不敢認成是個補兵問題，就是認成是實行我們主張也不够，我們這是打破地下組織，鞏固我們組織，惟一的好辦法。」

看他又說：

「我們今天如果摧毀不了他的地下組織，打不破他的基幹小組，就不易開展。但我們今天有什麼辦法，可以摧毀他的地下組織？……我們是要拿上實行兵農合一來打破他。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打破他！如何打破他的基幹小組？就是要用上堅強的狙擊小組來消滅他，他好比是個撈魚鱗，我們是打獵的，一定很容易的打破他！」（上面所引均見本年三月間閻氏在「徵糧會議上的講話」）。

這是什麼！大家看，山西的這個「打獵的」，不去打日本人，却去打「撈魚鱗」，却去打「他」。山西的「堅強的狙擊小組」，不去消滅日本人，却去消滅「他」，却去「摧毀他的地下組織」。在這些不在報紙上發表的話中，比起他對記者團談話時所說的：「捉到共產黨，訓練三天放回去」，「八路軍打我，我忍耐不公佈」，似乎有很多仁義道德似的，這裡就一點仁義道德的影子也看不見了，看得見的，盡是對人民對共產黨的萬丈殺氣！閻氏的所謂「他」是什麼呢？「他」就是人民，就是和人民在一起進行抗戰、建設民主的共產黨。閻氏的所謂「地下組織」是什麼呢？那就是人民的抗敵民主組

織和支持這個組織的共產黨。他所要打破的——據他自己的話——就是這個「他」，並不是敵僞。他所要消滅的，就是這末一種組織，並不是敵僞。閻氏所做的事情竟是這末爲親者所痛，而爲仇者所快！他的「兵農合一」，竟是這末從仇視同胞和從事內戰的動機而提出的！

還有，什麼叫做「如大雨普下，很快的就可以打破他」？還在一九三九年，閻錫山在秋林開幹部會議，準備襲擊新軍之時，他就告訴人們：「快要下雨了，準備雨傘罷，」就是說快要投降了。「大雨普下」即所謂「全面和平」，他歷來估計，總有那麼一天的。他認爲到了這種時候，對於共產黨，「很快的就可打破他」。作這種想法的，中國不只他一個，還有其他的人。然而時局的發展，不是「大雨普下」，而是日麗中天，一定要打倒日寇「無條件投降」，這也就成了閻錫山這批人的永遠的悲哀。

要問：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的主要矛盾何在呢？要問：爲什麼我們共產黨人特別受了閻錫山那樣的攻擊和仇視呢？問題的出發點就在於：我們共產黨人和閻錫山在思想、實際上，有完全不同的出發點。我們共產黨人思想和實際的出發點，乃是解放民族和

解放民衆。我們在政權問題上的一切採擇，全部是以此爲出發點，以此爲標準。毛澤東同志經常告誡我們共產黨員：如果我們這個黨不能替民族人民辦好事，這個黨就是毫無用處的。毛澤東同志在邊區參議會一個極著名的演說，而且被日寇認爲最可怕的演說，其中有幾句特別重要的話是這樣的：『國事是國家的公事，不是一黨一派的私事，因此共產黨員有對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的義務，而無排斥別人壟斷一切的權利。共產黨是爲民族、爲人民謀利益的政黨，他本身決無私利可圖。他應該受人民的監督，而決不應該違背人民的意旨。他的黨員應該站在民衆之中，而決不應該站在民衆之上。』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思想，這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實際。共產黨人和閻氏主要矛盾的出發點，就在於：共產黨無私利可圖（因此，堅決抗戰，解放人民，政權是人民所共有），閻氏一類人們則唯私利是圖（因此，認爲『親日亦未嘗無益』，束縛人民，固執着自己寡頭專制的政權，反對人民過問）。他們的攻擊共產黨，也就在於共產黨不圖私利。假如共產黨也是圖私利的，他們也就不會對它攻擊了。

把自己的私利放在精細的算盤上，把壓在人民頭上的特權放在惟一的心思上，真實，就被顛倒了，是非就被顛倒了，人民的擁護者就被看成『欲拔之而後快』的眼中釘了，

造謠就被當成攻擊人民擁護者的得意工具了。閻氏說：

『宣傳與鬥爭不同，把自己的好意叫人知道，把別人對自己的誤會給人解釋明白，這叫做宣傳，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這叫做鬥爭。』『我們的同志要將宣傳和鬥爭分辨清楚。宣傳有時可以不作，鬥爭一刻不可放鬆。不但不放鬆，更要以鬥爭對鬥爭。』（『革命行動』十卷十期）

這是閻氏鬥爭哲學的一部份。閻氏認為：『故意製造謠言，說自己如何好，別人如何壞』，是『一刻不可放鬆』的。他就是這末來對付共產黨的，而這回對記者團的談話，竟親自出馬了。對於我們，這也沒有什麼奇怪，這不過是兩隻眼睛只注在自己所壟斷了的私人政權，而絲毫不以天下、國家、民族、人民的利益、人民的前途為念的一切人們所必採取的手段。閻氏這個『鬥爭哲學』所告訴我們的，却正是：凡是閻氏所說『自己如何好』的，一定是不好的，因為如閻氏所說，這些都是『故意製造謠言』。而他們所說『別人何如壞』的，一定又是很好的，因為他們所說的『如何壞』，又不過是『故意製造謠言』而已。

就讓事實來證明吧！就讓山西的老百姓來表決吧！

以下我們要檢查一下閻錫山的『經濟計劃』和『政治計劃』的各種事實，來看出他從上述的出發點而實施在這兩個方面的具體結果。

二 閻錫山的『經濟計劃』

閻氏最近對記者團大吹特吹他的所謂『兵農合一』。他是這末說的：『根本上共產主義對勞動者是『先甜後辣』，與人土地，收上的糧食再行分配，無論如何巧妙的說法，根本的政治心理就得不到人的同情。我們是按勞分配，對勞動者是盡甜無辣，與人土地，不收人的糧，使人負擔，不要巧妙的說法，也能得到人的同情。』好吧，我們且按下閻錫山的所謂『共產主義對勞動者先甜後辣』，下面再說，先看看他的『盡甜無辣』吧！

閻錫山所謂『盡甜無辣』的『兵農合一』，按照他自己所述，是這末一回事：『兵農合一』，就是把役齡（按：指從十八歲到四十七歲）壯丁，每三個人編成一個兵農互助小組，……其中一個當常備兵，入營打仗受優待，其中兩個當國民兵，在家種地或做工優待人。